



赵海涛：当二里头考古的进度条走到2%

者探源



绿松石龙形器。



赵海涛与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



赵海涛在工作。



河南省洛阳市二里头遗址祭祀区以西区域考古发掘现场。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 赵海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

我是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的第四代队长,今年是我当队长的第三年,也是我在二里头工作的第二十个年头。20年对一个人来说不短,但在二里头面前,我和我的前辈们一样,都很年轻。

我们在2019年做过一次统计,二里头考古60年来,发掘遗址近5万平方米。按照目前的速度,二里头的考古工作全部完成需要3000多年,现在进度条才刚刚走到2%。

二里头这样的都城遗址,资料价值重大,遗存种类丰富,堆积非常复杂,发掘过程需要我们精益求精,尽可能多角度、全方位、多层次、多手段、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料信息,因此必然需要时间。

我是一个对生活充满好奇心的人,始终期待,前面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这是考古工作带给我的影响,它是一个不断有新发现的历程,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传奇。

最新发现 四车道 道路

今年9月,我们公布了二里头遗址考古近期取得的一些重大收获。2020年秋季至今,我们新发现了宫西路向北延伸200余米的道路,还有宫北路上的门道、宫城以西区域围墙的东南拐角等。

新发现的这200余米道路,宽约16米,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4条车道。这还不是最宽的,宫殿区外围的道路最宽能达到20米左右。在汽车逐渐普及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城镇道路的宽度也只有10米左右。二里头遗址至今发掘了5万多平方米,仅仅发现了两段间距1米宽的双轮车辙的痕迹,说明当时的双轮车的数量非常少。所以,铺设这么宽的道路,行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功能。

结合60多年的考古研究,我们认为,二里头都城主要是通过主干道路划分出调整的功能区,用两纵两横4条道路搭成一个井字形框架。在这个九宫格的布局中,祭祀区、宫殿区、官营作坊区,这3个最重要的区域在中路,宫殿区位居中心,这完全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都城规划特点,代表了我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

根据近年新发现,我们认为二里头都城极可能是以纵横交错的道路和围墙分隔形成多个网格。每个网格属于不同家族,极可能已出现了家族式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合一的布局。

二里头建都之初就出现了这4条道路,一直到政权被推翻,这些道路系统才被破坏。这样严格、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说明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存在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这是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可能也是井井有条、井然有序这些成语的源头。

这里普及一个小知识,器物相对好辨

认,道路是怎么发掘的呢?靠的是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功之一——认土。

中国的考古遗址大部分是土遗址,我们将分为两类:自然形成的土和人工活动过的土。这两类土的颜色、质地、所含物质都不同。例如,挖墓坑的过程会穿透很多土层,相当于把这些不同层次、颜色和质地的土无意识地搅拌,这些土被挖上来,等人埋葬之后,再回填。所以墓葬土又叫五花土,这给考古人提供了辨认依据。

同样是经人活动过之后的土,也有细微区别。例如,宫殿的土和道路的土都坚硬、质密,如何具体分辨?

修建宫殿就跟进建房一样,要先挖一个基础坑,在坑里铺上一层约10厘米厚的土,用工具把它夯打坚硬,再铺一层,再夯打。这样的两层土之间是有分界的,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就能看到宫殿土的特质:纵剖面分层,横剖面呈长方形。道路的土也分层,但因为长期行人走,路面上的覆土被碾压踩实,土的特点又不一样。车和人的重量有限,踩压不了多层。土层不断累积,会形成像千层饼一样的纵剖面,每层不过毫米之差。除了今年发掘的一段路面铺嵌了碎陶片,二里头时期的道路基本都是土路。

不爱兵器爱酒器

我们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但当时的人们没有把原料珍贵、技术复杂的铸铜技术大规模运用在战争上(发掘的铜兵器不过30来件,而且主要是只有几厘米长的铜箭头),而是用来生产大量酒器,已发现20多件。

我们发掘出几百件酒器(主要是陶器),有酿酒的、盛酒的、温酒的,这些器物内壁都检测出了酒的成分。当时喝的主要是米酒,度数低,冬天喝比较凉,所以会温

酒,酒在加热之后酒劲更大。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出现了粮食剩余,人们才会酿酒。所以,饮酒在当时是贵族的特权。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里写过夏人禁酒的故事,说大禹品尝有人敬献的美酒,喝得酩酊大醉,醒来说酒太好了,后世一定会有人为了把它家破人亡,于是下令禁酒。但看来似乎很难禁绝。至少在考古学上,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禁酒的证据。饮酒活动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社交,除了享乐,还有调整社会关系、体现社会等级的重要功能。

二里头遗址的手工业活动非常丰富。一般来说,一个数百口人的村子,一口水井就足够生活所需,但我们在一个约1000平方米的发掘区域里发现9口水井,有多口水井的间距只有一两米,这个密度远远超出一般生活用水的需求。我们推测,这可能是满足用水量较大的手工业生产所需。

考古有时候就是先设想,再寻找线索,一步步去验证假设。发掘没有结束,就没法知道下面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是考古学的魅力。不知道的地方永远比知道的要多,尽管知道的越来越多,但是不知道的还是会更多。

近年来,我们还首次发现了制陶遗存。在遗址西北部出土了800多片外表、断带有红漆的陶片,数量为以往历年发掘出土带漆陶片总量的近20倍,这说明周边可能存在制漆作坊。此外,在宫城西南角还发现了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

除了发掘到重要现象,通过综合研究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也很有意思。最近五六年,我对二里头文化晚期阶段的资料做了综合梳理,发现礼仪性的、政治性的大型工程,都在同一阶段遭到破坏,比如道路系统、宫城城墙、宫殿建筑群等。这些破坏是来自所谓商政权的前身和东夷人的先辈,说明当时二里头的政权很可能被推翻,它不再是一个都城。

但与此同时,二里头的铸铜、制漆、加工骨角器等手工业作坊还在继续使用,还新建了宫室建筑等大型夯土工程,说明二里头仍然是新政权中的重要聚落。这些当时的高科技工艺,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和设备设施,一般都会被再利用一段时间。二里头是这样,商周政权更替时也是如此。周的青铜器铸造水平要比商末差一大截。周灭商之初,先把工匠都留在当地继续铸造青铜器,后来才迁到新朝都城。考古发掘和研究如同侦破破案,发现蛛丝马迹、找到逻辑关系、建立证据链条,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这也是考古研究的魅力和乐趣。

二里头考古工作开展63年以来,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订了科学的计划,抓住了体现二里头价值的重大问题,持续不断地工作。第三代队长许宏老师曾经在《最早的中国》里说,二里头宫城是通过学术设计想出来并且验证得到的。实际上,二里头遗址的很多重要收获都是如此,是通过精心的学术设计、科学的计划安排而逐步取得的。

比如,最近刚公布的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多网格布局,也是通过对以前资料的深入研究、分析、推测,并字形道路划分的网格外围应该都有墙垣围护,而后从关键点发掘验证,并逐步扩大范围探索出来的。

四代队长的60年 接力

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著名史学家徐旭生先生发现的,当时他在豫西寻找夏墟,在偃师二里头村的麦田里看到了随处可见的陶片。我是河南人,1976年出生于南阳市唐河县,1995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96年被分配到考古专业。我和徐先生是同一年分配的同事,只是直到大二学习夏商考古,我才知道他的卓越成就。

多,但全国各地的考古队又很多,像安阳殷墟这种大型的考古项目可能会有四五个研究人员,其他大部分队伍只有一两个研究人员。当时二里头工作队的另一名成员恰好考上了研究生,只剩下许宏老师。于是,2002年硕士论文答辩结束,我就被他邀请来队工作。

从2003年起,我开始协助许宏老师主持现场发掘。到2010年,工地上的事基本是我在具体负责,我还是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的主编之一,并承担了其中近半的写作任务,还有大量的策划与统筹工作。这部400万字的报告后来被评为2014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成果和2014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许宏老师认为我贡献巨大。

二里头的钱队长,就在岗位上工作了20年。因此我的上一代队长许宏就多次公开表示,自己也不会超过20年。2011年3月,他主动辞职,推荐我来担任队长。他觉得是时候让我来带起这支队伍了。

那一年实在太紧张了,同时负责多项重要工作。2019年10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放,同期举办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纪念大会,我在发言最后没忍住落了泪。我说很感谢各级政府、各界人士特别是当地村民的大力支持,他们为二里头付出和牺牲了很多。当时各种情绪纠合在一起,突然就眼眶一热。

二里头考古的下一个20年

我刚来的时候,二里头遗址的社会关注度还比较低,我们主要就是做发掘研究的本职工作。我还负责跟当地的农民打交道,包括联系考古发掘占地的事情。在我工作的20多年中,至少占用过100户以上农民的耕地。考古占用农地一两个季度,农事就耽搁了,所以会根据占用时长和面积,按照一定的标准给他们赔偿。

有些考古发掘占用农地,对方可能会提很多要求。但洛阳周边的老百姓非常朴实,很支持也很信任我们,因为他们知道考古队不会让他们吃亏。

考古学是个与时俱进的学科,随着资料的积累、科技手段的应用和多学科的参与,考古学的理念与方法不断进步,从考古发掘中获取的资料信息会越来越丰富。现在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相比前60年,有了很大变化。

现在,我们科学制定勘探、发掘、研究规划,优先关注最能体现二里头价值和意义的核心问题,继续探索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布局框架、遗址的准确范围、外围防御设施、祭祀区分布、网格差别等,探索与二里头文化分区内各级聚落的深入关系、控制网络、统治文明等重大问题。

另外,我们继续加大与其他学科和学者的合作,让科技开拓二里头遗址发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我们希望能解决二里头时代的自然背景、经济基础、科技水平、资源来源、交通网络、社会关系、礼制系统、治理模式、统治文明等重要问题。

我们也要加快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考古报告的编写出版速度,加强对发掘资料的研究、阐释成果的发表和转化利用。整理资料、编写报告的过程,是对考古发掘成果的研究过程,同时也为学术界提供基础资料,研究成果反过来又能提升发掘和整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此外,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宣传、传播工作,宣传好二里头的内涵和价值,为民众提供丰富的历史文化 and 精神文化滋养。

在二里头这样重要的遗址工作,我很幸运,更多的是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既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心、使命感和责任感,努力做好当下的发掘、研究工作;也要有成功不必在我的心态,科学规划、按部就班、扎扎实实地推进工作。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杜佳冰根据赵海涛口述整理)

重返三国现场

大地上处处有关羽的足迹

厚待,宋孝宗时关羽已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正式敕封关羽为伽蓝,宫中做佛事也要抬出关羽像。与此同时,元杂剧中也出现大量赞美关羽的剧目,如关汉卿所作《关大王独赴单刀会》,成为后来《三国演义》中“单刀会”的母题。

明清两朝,关羽在官方与民间的合力推动之下走上神坛,帝王们希望借助对关羽的崇拜宣扬臣子对君王的忠心,而民众们则寄希望于关羽这样的神勇之人降世,驱邪避凶,护佑一方安宁。明太祖朱元璋将关羽列入国家祀典,每岁岁暮及孟孟遣官祭祀。嘉靖时,关羽已由关王升格为关帝。万历又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从此,关羽神像开始身着帝王衮冕,享受皇家祭祀,其地位与圣人孔子已经不相上下。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让民间仰慕的观念深入人心,关羽的形象在尊祠得到了极大的升华。

满清入关后,为增强对汉人的笼络和统治,对关羽的尊崇有增无减,清朝先后有八代皇帝对关羽层层加封,最后封号竟长达26个字。与此同时,晋商的崛起又让关羽在民间的形像进一步嬗变,在山西老家的推动下,关公与财神混上了等号,众多商人一掷千金为关羽修庙。

据学者统计,清朝中期,全国有关帝庙30万余座,仅北京就有116座,关帝庙的数量超过孔庙,居各种庙宇之首。随着明清以来中国人向海外迁徙侨居,关帝庙与关羽崇拜带到了世界各地,关帝庙已成为海外华人华侨寄托故土情结的重要场所。在如今的中华大地上,包括关帝庙在内的关羽文化遗迹仍十分丰富,可以串联起关羽的一生足迹。关羽的家乡是河东解县,即今山西运

城,位于运城盐湖区解州镇西关的解州关帝庙也成为关帝庙的祖庭。它始建于隋朝,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扩建,此后历代均有修葺。清康熙年间,康熙帝西巡至解州,拨帑金一千两重建,形成现今的规模和规模。解州关帝庙结构宏伟,仿宫殿,前朝后寝,和中轴对称的格局,崇宁殿为关帝庙主殿,内塑关羽坐像,着帝王衮冕。此外,运城城市常平乡还有被称为关羽家庙的常平关帝庙,除祭拜关羽父子,还依民间传说塑有关羽始祖关逢及关羽曾祖、祖父、父亲等塑像。

史载,关羽早年从河东亡命奔涿郡,与张飞追随刘备,三人恩若兄弟,民间传说遂衍生出桃园结义的故事流传于世。涿郡即今河北涿州,涿州松林店镇楼桑村村的三义宫,为明朝正德皇帝朱厚照亲赐匾书所敕建,以纪念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结义之举,殿内供奉有君臣三人及蜀汉臣子之塑像。楼桑桑社曾为涿州古八景之一。

建安五年(200年),下邳为曹操所破,刘备奔袁绍,关羽一度暂归曹操,并为曹操斩袁绍大将颜良,拜汉寿亭侯。之后,关羽不忘旧主,尽封曹操所赐,弃刘备而去。此事成就关羽义薄云天的美名,并被后世小说演绎为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在河南许昌城西有一座灞陵桥,即小说中关羽辞曹之地,存有明将左良玉所立汉关帝挑袍处碑。实际上,灞陵桥本在长安,民间话本在编写关羽辞曹的故事时,误将出发地设为长安。及至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将出发地改回了许昌,却保留了灞陵桥关公辞曹的情节。于是,灞陵桥送这一唐代以来的文字送别意象,在关羽与许昌身上又有了新的承袭与延续。关羽复归刘备后,与刘备奔荆州刘表,驻新野7年之久。今河南省新野县中心有

一株枝干遒劲、冠盖若伞的桑树,与其他桑树不同的是,它的四周紧紧包裹着一圈两米多高的城墙,这座只有10余平方米的汉桑城,被称为世界最小的城。民间相传,关羽在新野驻军时,一日不慎,其坐骑赤兔马将百姓的桑树啃光。关羽为补偿,亲手栽种了一株桑树,又让士兵砌了一圈城墙将它包围起来,这便是汉桑城的由来。

由于关羽在荆州驻军多年,在河南、湖北、湖南等汉未荆州故地,此类与关羽事迹相关的遗迹尤多,虽然它们大多未必合乎史实,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都可视为三国文化、关公信仰在民间传播的实证者。

单以关羽的武器为例,民间传说中关羽擅使青龙偃月刀。传说关羽攻打长沙之时,不慎将刀落入湘水,周仓逆水而上,将宝刀捞了上来,遂有此河之名。

顺便说一下周仓,在《三国演义》里,他为一个帮关羽的大,鞍前马后,忠心耿耿,这是一个非常丰富形象而虚构的角色,在历史中并不存在。而在湖北当阳东南,竟也有一座周仓墓,有墓冢、墓碑和塑像。人们对周仓的纪念,实际上也是关羽忠义精神的另一种延续。

历史上第一个以关羽命名的地名,是湖南省益阳市的关羽滩。《三国志》载,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和刘备争荆南三郡,双方对峙于益阳,隔资水相望。关羽择选锐士五千人,欲投上流十余里浅滩渡河,孙权

大将甘宁自率兵千余人连夜前往设防。关羽由是不敢渡河,结营于北岸,此地遂名关羽滩。《三国志·吴书》在叙述陆抗的都督辖区时,有自关羽至白帝”的描述,可见在东吴末年,关羽已成为益阳的代称。关羽滩的位置,据考证在今益阳市六中以西资水中青龙洲一带。关滩惊涛,还是资江十景之一。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败走麦城,在临沮为孙权所获,旋即遇害。《吴历》云,孙权将关羽首级送至曹操,曹操以诸侯之礼葬之。若如是,则关羽死后身首异处,分葬两地。如今洛阳关林与当阳关陵,相传即关羽的两处墓葬。按古代礼仪制度,帝王墓称陵,圣人墓方得称林。关羽墓称关林,可见其地位已超越帝王,跻于圣人之列,与曲阜孔林平级。

史书对关羽的相貌并没有具体表述,仅能够从诸葛亮在书信中称关羽为髯,可知关羽应留有美须长髯。现存最早的关羽画像像是西晋时期的木刻画《义勇武安王位图》,图中关羽丹凤眼、卧蚕眉、美须髯,与如今流传的关羽形象无异。

义勇武安王为宋徽宗加封关羽的尊号,可知早在北宋末年,关羽这一经典造型就已形成。该画像出土于内蒙古黑水城遗址,20世纪初为俄国入科兹洛夫盗掠而去,现藏于俄罗斯圣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幅《关羽擒将图》是知名度较高的一幅关羽画像,为明宣宗时画家商喜所绘。画中所绘为关羽水淹七军之后审问庞德的场景,画中关羽身着绿袍锁甲,抱膝斜坐于石台之上,长髯飘逸,神态威严。现今流传的关羽造像或画像,大抵与之相似。(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协会会员)



河南洛阳关林。

成长/摄

成长

近日,曾在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里饰演关羽的演员陆树铭去世,这一消息引发了许多人的悼念。关二爷走了,人们对陆树铭的追思,既是对他完美演绎关羽的认可,也是对关羽人格魅力与忠义精神的追慕与遥望。穿越1800多年的风雨,关羽仍然活在人们心中。

从介子“亡命之徒”到一代名将,再到封神榜中的“关帝老爷”,关羽是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观。行走中华大地,乃至海外他乡,关帝庙遍布四方,关公信仰植根人心。从庙堂到江湖,从都市到乡间,关羽所代表的忠义精神,影响着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正史中关羽的事迹,主要见于《三国志·关羽传》,但记载甚略,仅953字,加上裴松之注引也不过千余字。在史传中,关羽以武勇闻名,时人多称赞其“勇冠三军,万人敌,猛虎之将”。至唐朝,关羽的形象仍未超出猛虎之范。

北宋初年,关羽曾因仇国所擒的经历,一度被宋太祖从武庙中撤出。关羽地位的提升是在宋徽宗年间,宋徽宗出于弘扬忠义精神、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陆续加封关羽为“忠惠公”“昭烈武安王”“义勇武安王”。由于宋徽宗崇信道教,他还封关羽为“崇宁至道真人”,让关羽跻身道教仙班。及至南宋,因为朝廷偏安江南,蜀汉正统论成为主流,身为蜀汉武将的关羽更受到格外



西夏木刻版画《义勇武安王位图》,出土于内蒙古黑水城遗址。



河南新野汉桑城。



湖北当阳关陵。